

中古文史丛稿

曹道衡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1209.2
12

中古文史丛稿

曹道衡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 宁

装帧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李晓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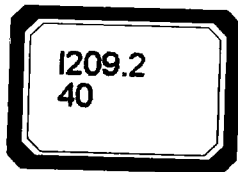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文史丛稿/曹道衡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11

ISBN 7-81028-940-3

I. 中... II. 曹...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文集②史学理论-中国-古代-文集
IV. I206.2-53②K09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499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88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880mm×1230mm)

印张:11.25

字数:27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

定价:22.00 元

自序

自从1999年拙著《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倏忽又逾三年。在这三年来，我又写了一些拙文，蒙河北大学出版社不弃，惠予结集出版，使我十分感激。尤其是詹福瑞先生的推荐和支持，更使我衷心感愧，谨在此致谢！

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收的文章，有不少是关于地域、家族等因素和学术、文艺的关系。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虽已考虑多年，却一直未敢笔之于书，原因是这问题颇为复杂，而我的学力有限，所以颇为犹豫。直到去年，才向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关陇与河朔”（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这个课题在去年底已初步完成，共包括六篇文章即：《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等。其中像北朝河朔地区学术文化的问题，曾在北京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中试讲过，并得到一些先生的鼓励。在对北朝学术文化的地域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后，我又想把目光移向南朝。关于南朝文化的地域问题，我在过去也曾想到过，如十几年前所作的《略论晋宋之际的江州文人集团》一文，已多少有所涉及，但未进一步探索。这次所收《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及《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二文，可以说是对这种研究的延续。但南朝的地域问题较诸北朝尤为复杂，因为南朝士人中有很多是北方的移民，如王、谢二族，本是琅邪、陈郡的高门，南迁后又有时居建康，有时居会稽，两地文化也多少有别，因此这种探索，还只能是初步的。在进行这种研究时，我深

感自己的学识有限,难于深入。今年夏天,有位先生从南方来京,顺便过访,我曾对他谈到:自感对音韵之学缺乏理解,因此对“永明体”的出现及律诗形成的问题很难进一步探讨。这种缺陷只能在今后去努力修补了。

除了对南北朝学术、文艺与地域、家族的关系问题外,近年来我又写了几篇关于先秦文学的文章。这是我退休以来早已想做的工作。因为我年青时曾作过一些关于先秦文学的研究,很想退休后再在这方面作些努力。但退休以来,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从去年起由于某些工作的需要,才初步对《诗经》和《左传》作了一些研讨,但自觉荒疏已久,还只能是一些粗浅的认识。错误当较其他文章更多。

岁月如流,马齿日增,忽忽已年逾七十,精力日衰,但只要还有可能做些研究,我是不想搁笔的。希望在今后,仍能取得一些进步,更希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曹道衡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时年七十有四

目 录

自序·····	(1)
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	(1)
从《文选》看齐梁文学思潮和演变·····	(16)
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	(35)
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	(44)
论东晋南朝政权与士族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62)
秦汉统一与各地学术文化的发展·····	(79)
试论北朝河朔地区的学术和文艺·····	(94)
“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	(115)
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和文化·····	(127)
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	(136)
西魏北周时代的关陇学术与文化·····	(151)
南朝文学史上的王谢二族·····	(164)
南朝文学的衰落·····	(173)
陆机事迹杂考·····	(183)
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	(197)
论梁武帝与梁代的兴亡·····	(214)
北朝文学六考·····	(231)
魏太武帝和鲜卑拓跋氏的汉化·····	(242)
《文选》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臆考·····	(252)
关于应璩事迹的臆测·····	(255)
“五经”的排列次第及其形成过程·····	(261)

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271)
关于《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286)
论《毛诗序》对几首诗的解释·····	(305)
《春秋》与《三传》说略·····	(311)

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 《文选》学之兴盛

萧统所主持编纂的《文选》，虽成书于梁代的中期，而经历了陈、隋二代，似乎较少有人注意研究。即使在梁隋之间曾经出现过一个萧统之子萧誉所建立的后梁，而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又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女，即萧统的曾孙女。后梁子孙始终显贵于隋代。然而直到唐初编定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关的研究著作仅有萧该的《文选音》3卷。到了唐代，情况就不同了，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就有李善注60卷；公孙罗注60卷；萧该《文选音》10卷；公孙罗《文选音》10卷；释道淹《文选音义》10卷。此外，像《儒林·曹宪传》载，曹宪也曾撰《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却未被著录；又如迄今尚存的“五臣注”则直到《宋史·艺文志》中才见著录；至于日本所藏《文选集注》中保存的陆善经等人的注文更不见于各类书目。可见在唐代，研习《文选》并为注释的人很多，只是留存至今者较少而已。

唐代人的热衷于为《文选》作注，正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试看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此表作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距唐代的建立正好四十年左右，可见对《文选》的重视，是在唐初就开始的。根据现有的史料，说明唐初对《文选》的研读十分普遍。《新唐书·文艺·李邕传》载，邕父李善“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旧唐书·儒林·李善传》略同）。又《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唐张鷟《朝野僉载》：“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这后一条史料虽属小说，却也说明《文选》之学已普及到了乡学中，可见读者之广。这种人人争读《文选》的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一般的看法

都认为这是由于隋唐以来实行了科举制度,以诗赋取士的结果。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因为以诗赋取士只能使当时的士人致力于诗赋的写作,而未必都要去攻读《文选》。因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及唐初存在着许多诗、文和赋的总集,都可以供应举者取法,而大家却一致选择了《文选》,其原因显然和当时文坛的风尚及唐初君臣爱好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联系到隋唐文风的形成、演变以及南北朝文风的融合来加以解释。

一 北朝文学的发展和南北文风的融合

当我们注视从南北朝直到唐初的文学史时,就可以发现:在南北朝时代,绝大多数作家都出生于南方;到了隋代,北方籍作家在艺术成就上赶上南方作家,而到了唐代建立之初,据两《唐书》的记载,南北方出身的作家人数已经差不多了,稍后出现的“初唐四杰”中,北方籍作家占三人,只有骆宾王一人出身于南方。这说明北方文人的水平已赶上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南方。但这个赶上和超过的过程,正是北方文人努力学习南方文风的结果。

我们知道,从西晋灭亡以后,北中国长期处于各少数民族军阀的入侵和混战之中。北魏拓跋氏的统一北方,虽然结束了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但由于鲜卑贵族与汉族士大夫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隔阂,而北魏初年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也多少抱有歧视态度,因此在文学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起色。北魏初年的汉族士大夫,虽有一部分被征辟出任官吏,但和鲜卑贵族之间的关系颇不融洽。《魏书·崔暹传》载,崔暹向魏道武帝建议,用桑椹补充军粮,却说到了《诗经》中讲过鸛鹑食桑椹变音的事,意在讥刺鲜卑人,使道武帝怀恨在心,后来借故赐死。《宋书》卷五九《张畅传》载,宋、魏在元嘉后期的战争中,李孝伯曾为魏使,在阵前对张畅说:“长史,我是中州人,久处北国,自隔

华风，相去步武，不得致尽，边皆是北人听我语者，长史当深得我。”这也反映了北方士大夫们的心态。这时的北方士人即使到北魏做官，但心中向往的还是南朝所代表的汉族文化。但由于当时北方士族多数留居家乡，到平城做官的人不多。留在乡里的士大夫又很少交往，因此很少“以文会友”的机会，大多数人处于“独学无友”的情况下，文学很难进步。在南方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驰骋文坛、争奇斗胜之际，北方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

北朝文学的兴起始于魏孝文帝时代，当时的北方士族就颇为仰慕南朝文化。他们对南朝文人的创作很注意。《南齐书·王融传》载，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亦即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北魏派房景高、宋弁出使南齐，南齐派王融去接待。宋弁就向王融提到了王融在两年所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房景高也说：“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宋弁读后说：“昔观（司马）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这些话都表明北朝士人对南朝文学的衷心歆羡。他们这种心理是不难理解的。由于他们久居乡里，平素所能接触的只是汉魏西晋以前的作品。一旦见到像颜延之、王融等人那种辞藻绚丽、对仗工整而又注意声律的新体文章，不能不叹为奇观。这种心态决定了北朝作家在创作上必然要取法南朝。然而，他们要效法南朝人的文风，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北朝文学也有自己的传统。早在西晋灭亡之际，黄河以南的多数士人虽已随东晋南渡，而黄河以北的高门大族如崔、卢诸姓，仍留居北方。他们为了避免各少数民族军阀的侵扰，大抵聚族而居，结成“坞壁”以自保。这些“坞壁”中的人和外界虽很隔膜，但内部仍有父子兄弟相传的一定文学活动。其中一些世家大族也各有若干藏书。他们的文学活动自然是以这些祖上遗留下来的典籍为范本。所以北方一些士人对西晋以前的作品有时也颇熟悉。例如《魏书·李彪传》载，李彪奉魏孝文帝之命出使南齐，曾对齐武帝背诵阮籍的《咏怀诗》，其中还有今本《咏怀诗》中已散失的逸句。这说明即使在十六国和北魏初年，北方广大地区的文学仍有其伏流。据《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说，十六

国和北魏初年一些人的文章“有永嘉之遗烈焉”。这就是说他们保留着西晋末年的文风。现在我们看到的像崔浩、高允等人之作，诗大抵为四言，文亦多质朴的散体，较之西晋末年的诗文已乏文采，更不要说南朝人之作了。到了魏孝文帝时，北朝文学号为复兴，其实只是长期冬眠之后的起步阶段。所以《魏书·文苑传》说这时北魏文人的情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这大约不算过于贬抑。如果我们看看当时人的创作，像郑道昭的一些诗，显然有意模仿郭璞，但显得古奥拙朴，远不如郭诗之成熟；据说是魏孝文帝亲自执笔的《吊比干文》典雅朴茂，有一定特色，但与南朝人碑文则大异其趣。当时较有名的文人如常景、袁翻和稍后的温子昇则文风与南朝人的文风颇相接近，可以看得出是有意取法南朝。如常景《蜀四贤赞》之模拟颜延之、鲍照的诗；袁翻《思归赋》之仿效鲍照、江淹的赋，都属显而易见的事实。温子昇的文名比常、袁更盛，据《魏书》本传说，梁武帝见了他的作品，竟说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其实细看他的《寒陵山寺碑》，其手法和辞汇仍与江淹的《尚书符》、陆倕的《石阙铭》等一类骈文出于一辙。这三位作者所以受到人家称赞，是因为他们的文风比他人更接近南朝。这也不足怪，常景据《魏书》本传，祖上曾长期居住在凉州，深受十六国时代河西文化的熏陶；袁翻、温子昇则都是南方人的后代，所以接受南方文风较易。当时出身北方的文人如祖莹也写过一些较好的文章，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所载他代元顼致魏孝庄帝的信，亦有骈俪气息，但文体似更近魏晋，与南朝文风有别。他虽能文，却未必擅长作诗。《魏书》本传载有他的《悲彭城》一首，全仿王肃的《悲平城》，此外并无诗作留传。他对当时人一味模仿南方似有不满。所以曾说：“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见《魏书》本传）这种意见在当时文坛上，似乎影响不大。不过当时北方文人的作品，虽力图学习南方，而气质上终究不太一样。当时北人的文，在辞藻对仗等方面毕竟不如南方人华丽；诗更显得稚拙，如《魏书》所载韩显宗、李骞等人的一些诗，尤显稚拙，无法与南朝诗歌并论；至于赋的区别似乎更大，当时北人的赋如阳固《演磻赋》、李骞《释

情赋》、李谐《述身赋》等,还可以看出他们受汉、晋作家如张衡、潘岳等人的影响,和南朝鲍照、江淹等人有别,至于和同时的南人如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的一些小赋更有显著区别。

此后的北方又因魏末高欢和宇文泰的争权而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其后又变为北齐和北周。这时北方原有的文人,大抵留在东魏——北齐的区域;至于西魏——北周所占据的关陇地区,本来不是北魏时文化发达的地方,所以产生的文人甚少。正因为这样,两地的文学发展也走着不同的道路。

在东魏——北齐地区,由于拥有北魏以来产生的一些文人,所以文学的发展仍沿着魏末以来的道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要算邢劭和魏收。据《颜氏家训》和《北齐书》记载,邢劭的诗文全仿梁代的沈约,魏收则纯学梁人任昉;两人还互不服气,各立门户,攻击对方。从他们现存的作品看来,两人的文风与沈约、任昉还有不小的差距。邢劭的诗,只学到了沈诗的平易,而远不如其清丽工巧;魏收的骈文也远没有像任昉之作那样丰富多彩,曲尽其妙。因此从现存的作品看,邢、魏二人都乏传诵之作。这是由于北朝文学的传统积累还不如南方文人深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赶上的。邢劭在《萧仁祖集序》中说:“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见《全北齐文》卷三)这段话在理论上显然没有错,但具体到当时南北文风的差别,却更多地表现了北人学南而不及。

邢劭和魏收的晚年,南方的梁朝已遭侯景之乱和江陵的陷落,有一些南方文人逃奔北齐,如颜之推、诸葛颖、萧悫等。他们的到来,使南北文风的融合进一步加强。这时南方出身的文人和北方文人的文学思想仍有差别。据《颜氏家训·文章》载,南方文人都欣赏梁王籍的《入若耶溪》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二句,而邺下文人如魏收、卢询祖等却认为“此不成语,何事于能?”萧悫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颜之推和荀仲举、诸葛颖等南方人都很赞赏,而卢思道却不满意。这一方面说明北方文人对诗已有自己的见解;另

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南朝诗人以奇险出新的手法还不太理解。其实王籍的两句正如颜之推所说出于《诗经》中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以声响反衬其幽静。后二句则不过以写景来衬托心情，在谢朓《冬绪羁怀示萧咨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中“风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及沈约《早发定山》中“野棠花未落，山樱发欲然”等句中已肇其端。

邢劭和魏收之后，在北齐境内最著名的文人要算卢思道和薛道衡。他们都活到了北周灭齐及隋文帝代周之后，所以习惯上把他们当作隋代作家。卢思道是邢劭的学生，他的诗文成就似已超出前此的北朝作家。《朝野金载》卷六记庾信出使东魏后南方人问他北方文士的情况，他除了称赞温子昇外，又说“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从年代来看，庾信到东魏时，卢、薛尚在童年，所以未必属实。但反映了唐人对他们的看法。从现在的北齐诗文看来，这见解是对的。卢思道兼擅诗文，而诗名尤盛。唐代诗人卢照邻曾说：“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见《南阳公集序》）近人刘师培也说：“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逸响。”（见《南北文学不同论》）他的创作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年在北齐时的诗文，大抵模仿齐梁，如骈文《辽阳山寺愿文》和《夜闻邻妓》、《赋得珠帘》等诗，尚未见特色；而最出色的作品则产生于晚年，如《听鸣蝉篇》，作于入周以后；《劳生论》作于隋代；《游梁城》诗，似亦从高颍伐陈途中作。薛道衡的年龄比卢思道小，他最有名的作品如《昔昔盐》、《人日思归》皆作于隋代。他的文风和卢思道不完全一样。大抵卢氏诗文接受汉魏以来传统较多，诗风爽迈劲挺；薛氏的诗更近南朝之绮丽柔靡，只有与杨素赠答的两首，稍显清刚，但骈文《老氏碑》、《高祖文皇帝颂》尚略存古气。所以薛氏之作似更为南人所认同；而卢氏却较多地得到后人的推重。正当卢、薛等人在北方文坛初露头角之际，南方的文坛却日渐趋向衰落。这是因为当时南方的文学活动大抵集中在宫廷或一些将相大臣的邸宅之中，那些文人无非流连声色或写一些咏物诗，很少面对社会生活，只在字句的技巧上下功夫。这样，他们的作品题材不免窄狭，手法也欠多样。尽管这些诗也写得平稳妥帖，很少病累，却没有深切感人之

处。所以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陈人张正见深表不满,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陈叔宝也颇有疵议。在这种情况下,后代的读者转觉卢、薛等北人之作胜于南人。但在当时北方籍的文人人数仍少于南方,其中有些人如刘邕等,仍一味地模仿南人,而南方文学毕竟有着长期的传统积累。因此总的趋势还是“南风北渐”。这种趋势表现在许多文化领域中,如经学、书法等等都是如此。

至于割据在关陇地区的西魏和北周,情况又颇不同。这个地区虽然在汉代曾经是学术文化的中心之一,但经过西晋末年和十六国的战乱,更加上北魏时代政治中心的东移,原来关中的大族如韦、杜、皇甫诸姓中许多人,亦已东迁。所以在宇文泰起兵割据之初,这里已没有什么可称道文人。宇文泰出身武夫,且当时致力于政治和军事,无暇关心文学,他只强调文诰的实用性,所以叫苏绰作《大诰》,要求公文一律使用散体,甚至模仿《尚书》。但这种用行政手段来改变文体的办法,显然行不通。在他派兵攻克梁代的江陵之后,南方作家庾信、王褒等人先后来到长安。南方的文风就很快地在关中流行起来。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周明帝)和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逖都是庾信文风的追随者。宇文逖所作《庾信集序》,文体就毕肖庾信。当时关西一带就流行着类似南方梁后期的文风,与北齐旧境有别,而与陈代人反而相近。后来唐初史家如令狐德棻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魏徵领衔的《隋书·文学传论》对此颇有非议。当时那些关陇文人之作,多半散佚,现在已难详论。但把柔靡绮艳的文风归罪于庾信、王褒,未免有失公允。事实上庾、王在南方时的作品虽多近“宫体”,而入北以后,由于处境的改变,文风亦与前大有不同。庾信入北以后那些思念乡关、自悲身世的诗赋,与萧纲辈之作,本不应等同看待。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可谓确当不易之论。至于王褒的《渡河北》诗、《与周弘让书》,亦非意浅文繁、纤弱轻巧的梁陈艳诗作者所可企及。关西文人当时倾倒于南朝的浮华文风,未必全部来自庾、王;而且他们缺乏庾、王的经历和体验,也容易得其皮毛而遗其神髓。事实上在北周至隋初,关中籍文人

还没有创作出什么可以称道的作品。相对来说,同样是学习南方,而北齐旧境的文人还能博采汉魏晋宋的传统,别具一些典雅遒劲的特点,视关西为胜。

隋文帝杨坚和宇文泰一样出身于北魏末年的“六镇”军人,对文学也不重视,他同样只要求文学更便于为他的统治服务。他即位不久,便采纳了李谔的意见,禁止浮华的文风,曾将文体华丽的司马幼之治罪。这种手段自然同样不能奏效,甚至他的儿子们也没有照办。他的长子杨勇就喜爱庾信的作品,曾命魏澹为《庾信集》作注。另一个儿子炀帝杨广早年诗文学庾信,稍后则文风稍变古朴,据说是受了柳眚的影响(见《隋书·柳眚传》)。但炀帝后期的诗却和梁陈“宫体”并无二致。这说明他在一个时间内文风稍有差别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在他即位之后,所宠信的文人多出身南方,说明他是梁陈文风的热烈追随者。

隋代的统一使南北各地的文人聚集到了长安,促进了文风的融合,但北方籍文人仍保持某些清刚的特色,除卢、薛二人外,像孙万寿、元行恭、尹式、杨素等的诗都是这样。但大多数人仍未脱梁陈遗习。直到唐初,还没有太大变化。即使像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有时也受此影响。据《大唐新语》卷三云:“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他的规谏深得唐太宗采纳。但就是这位虞世南现存的诗中,近于梁陈诗风的作品也不少,有些还可归入艳诗之列。不过这些诗,有的作于隋代。在一种文风盛行之时,某些人即使知其弊端,也未必能完全摆脱其影响。

如果说唐太宗和虞世南虽曾染指“艳诗”写作而已深知其弊的话,唐初有些人已挣脱了梁陈余习,给人以一些清新的感觉,如王仲牟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很称赞魏徵的《出关》和王绩的《野望》。这样的作品当然还不止这两首。值得注意的是魏、王二人都出身北方,他们的这些诗,不能说和原来北齐旧境一些诗人的传统没有关系。尤其魏徵是唐太宗时名臣,王绩又是唐初不少开国将相的老师王通

之弟,他们的创作实践对后来唐初史家的鼓吹南北文风融合应该有重大影响。

二 唐初君臣对南北文风的态度

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两个对峙的地区在政治上统一以后,总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努力地效法先进地区,而不管是哪一方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所以隋唐统一以后和西晋的统一在文化方面有着相反的现象。二者虽都以北方战胜南方结束,而西晋的统一据《抱朴子》记载,是使南方人竭力地模仿北方;至于隋唐的统一则使北方人全面地学习南方。举例来说,唐代经学根据朝廷规定:《周易》用魏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经》用《毛传》,“三礼”用汉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晋杜预注。这与南朝制度全同;而北朝的规定则《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汉服虔注。不但如此,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所编撰的《五经正义》,也基本上全用南朝人的学说。尽管孔颖达本人是北方人,早年学的是北方流行的学说。在书法方面,唐太宗本人就是王羲之的崇拜者;唐初最流行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都出自王羲之,而欧、虞、褚三人都来自南方,薛年辈较晚,书体主要学褚。其他文化部门也与此类似。文学的情况更不必说,我们在上文已详述了当时南风北渐的情况。唐太宗和他的一些大臣如魏徵、虞世南等都擅长诗文,对文学的发展趋势也有清楚的认识。作为帝王,唐太宗也和其他君主一样,主张文学须为他的政治服务。据《贞观政要·文史》载,他曾批评扬雄、司马相如和班固的赋“文体浮华,无益劝诫”;有人表请为他编文集,他不同意,说:“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辞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其实他自己能诗能文,为了表彰房玄

龄勋绩曾作《威风赋》以追思创业之难及群臣辅佐之功来赐给房；为了悼念虞世南，他曾“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皆见《贞观政要·任贤》）。他称赞虞世南的五大长处，其中有一条即“词藻”（见同上）。可见他丝毫不轻视文学的作用。他也明知当时的文学趋势必然是以学习和继承南方文风为主潮。他所不赞成的只是梁后期“宫体”出现以后的浮华文风。但是，这种文风的影响当时已弥漫文坛，很难用强制手段来改变它。唐初君臣正是看清了这个形势，而没有重采周、隋的故技。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知道，用行政命令来改变文风既难奏效，而放任自流亦非良策，较好的办法只能是利用一定的场合，因势利导，让士人们有分析地对待南朝文学的传统。在这方面，他们在纂修几部史书时，就对此颇有用心。例如以魏徵领衔署名的《隋书》，在这些书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此书虽记隋代史事，而其中“志”的部分，实际上兼综南北朝以来典章制度的沿革；而其《儒林》、《文学》诸传，也对南北朝的学术和文艺作了总结性的论述。在《文学传》中写道：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阳温子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辘轳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